

《诗经·商颂》之文史价值探析

朱凤祥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摘要:《诗经·商颂》是殷商后裔的祭祖乐歌,它以独特的创作形式,展现了其文本的语言之美和音乐之美,从而代表了殷商时代文学语言的最高成就。同时,它作为殷商民族的史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因之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商颂》;文学价值;史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2021)04-0123-07

《诗经》之《风》《雅》《颂》三者当中,从其思想价值与文史成就来看,十五国风为上,次之为二《雅》、三《颂》。三《颂》当中,关于《商颂》的研究,以前学者探讨的重点是《商颂》的创作年代问题,而对其文本价值的分析则不大关注。其实,《商颂》虽然是殷商后人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多为歌颂祖先神灵之辞,在内容上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也无法否定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史价值。《淮南子·修务训》云:“服剑者期于铍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觞号钟;诵《诗》《书》者,期于通道略物,而不期于《洪范》《商颂》。”^{[1]1361}《尚书》中的《洪范》篇,主要谈论天地之大法、人间之治道,堪称中国古老的哲学宝典。《淮南子》将《诗经》中的《商颂》与《洪范》篇相提并论,且喻之以墨阳莫邪、骅骝绿耳等名剑、骏马等宝物,可见《商颂》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地位是极高的。今传《毛诗》中的《商颂》共有5篇,依次为《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那么,《商颂》的价值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商颂》的文学价值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首先是文学作品。关于《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明代文学家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云:“《三百篇》为后世诗人之祖,信矣。”^{[2]800}诗论家胡应麟《诗薮》云:“《诗》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无法者

乎?……皆文义蔚然,为万世法。”^{[3]3}他们都把《诗经》看作中国诗学的源头、中国诗学理想的最高典范。《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是就《诗经》的整体地位而言。说到《商颂》的文学价值,则主要表现在它的艺术特质上,具体而言即《商颂》的语言之美和音乐之美。此外,《商颂》之四言诗体对后世亦有较大影响。

(一)《商颂》语言之美

《文心雕龙·声律》云:“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4]552}就是说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是表达情感的枢纽。语言文字使用得体能使描写对象逼真传神、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从而使读者在品读中体悟情感、浸润人格、通达人生。就《商颂》而言,其语言文字之美主要表现在音韵之美和意蕴之美上。

首先,《商颂》的音韵之美。《诗经》最美的地方在于它的声韵结构,这也是其语言美的主要表现。《诗经》音律极富音韵美感,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品起来韵味无穷、漱口留香,如清风拂面,似醇酒醉人。这是因为它具备了音韵之美。《文心雕龙·声律》云:“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诗人综韵,率多清切。”^{[4]553}刘勰认为,动听悦耳的词句,宛如成串的珍珠相连不绝。他还认为,《诗经》的作者运用音韵,大都清晰、准确、真切。在《诗经》中,末字相逢或音韵相同的语句有很多,这是作者有意而为

收稿日期:2021-03-1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BLS012)

作者简介:朱凤祥(1966—),男,河南柘城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商丘地方文化研究。

之。作者为了将感情或者气氛表达得更为真切、彻底,同时让读者吟诵起来具有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感,常常会制造一些末字相逢或音韵相同的语句。就《商颂》来说,如《那》篇:“鞀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于赫汤孙!穆穆厥声。”这里,三句话、三个“声”字的叠用,不仅读起来具有音韵上的唯美感,而且将祭祀中“殷人尚声”的音乐歌舞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从而凸显了商汤之孙的显赫地位。有时,每一节甚至每一句都会押一个韵,如《烈祖》篇:“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鬯假无言,时靡有争……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飧,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篇中“成”“平”“争”同属一韵,而“穰”“疆”“将”同韵。再如《长发》篇:“溶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这些诗句更是句句用韵。《礼记·乐记》云:“文采节奏,声之饰也。”^{[5]1113}要将声音展示得充分和美好,需要语言的韵律节奏来装饰。而通过语音、字词或句式的重复,可以形成声音的高低起伏之美、抑扬顿挫之美、回环往复之美。

《商颂》的音韵之美还表现在大量使用叠字重言。字词的重叠往复不仅会产生一种天然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且有利于渲染诗歌气氛、营造诗歌意境,进而提升诗歌的表达效果和思想传递。《诗经》305篇有将近200篇使用了叠字。如《商颂》的《那》篇有“简简”“渊渊”“嘒嘒”“穆穆”,《烈祖》篇有“嗟嗟”“鸛鸛”“穰穰”,《玄鸟》篇有“芒芒”“祁祁”,《长发》篇有“芒芒”“烈烈”“迟迟”“优优”,《殷武》篇有“翼翼”“赫赫”“濯濯”“丸丸”。这些叠字,或为表达情感的感叹词,或为写形状物的形容词,或为描摹钟鼓管乐的拟声词。它们在增添诗词的唱叹效果以及强化对象描述的逼真性、立体感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些篇章,叠字重言体现在上、下节的对比中,使得诗句显得更加整齐划一、井然有序。如《长发》篇:

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庞,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戇不疎,百禄是总。

这2节诗句字数相同、上下对称,构成排比、对偶句式,看上去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练集中,读起来节律明快,堪称后世诗词对仗之滥觞。

其次,《商颂》的意蕴之美。语言作为作者表情达意的载体,具有信息传递功能,其背后有着丰富的意象和深厚的情感。《淮南子·泰族训》云:“今夫

《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1]1425}《诗》之《雅》《颂》诸篇,蕴含先王开基立业、定国安邦之意旨,其字字句句,皆由情而发,精意雄浑,感格鬼神,能使君臣父子和睦相亲,成教化、助人伦。《商颂》正体现了这种语言意蕴,读者可以从中品味出其言外之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6]861}。商周时期,祭祀是和战争一样重要的头等大事。《诗经》里的祭祀诗,大部分都在《颂》里。《商颂》之《那》《烈祖》《玄鸟》3篇,皆为祭祀商朝祖先的乐歌。祭祀是对祖先神灵发自肺腑的情感倾诉,因而在语言表达上显得雄浑大气,肃穆而不冷漠。如《烈祖》篇云:“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嗟嗟”一词首先烘托了对列祖的无限崇拜,而后主祭者以列祖洪福齐天、泽被后世,表达了祭祀者们对先祖的无限敬仰之情。再如《玄鸟》篇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表面上是讲“玄鸟生商”的故事,文字背后则是昭示殷商始祖契乃受命于天,具有神圣的地位。又“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四海来假,来假祁祁”云云,描述了武丁孙子对武丁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钦佩之情、自得之意。武丁复兴商朝,开创盛世,在殷商后裔心目中,他就是神的化身。而一句“武王靡不胜”,突出了武丁作为人的自信和英雄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远古时代初民对祖先和上天的敬畏之心,他们希望通过祭祀来获得一种情感的皈依、一种血缘和宗族的认同。正是这种“发于词,本于情”的虔诚祈祷,收到了“君臣以睦,父子以亲”的和谐之效,进而上升到一种感情上的家国认同。关于《商颂》的语言意蕴所达到的文学效果,曾有学者如是说:“《商颂》的审美意蕴,集中到一点,就是透过文字,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以主祭商王为代表的殷商统治阶层丰富的心理活动。尽管作者在描述祭者心情时已经相当准确和直白,但读者仍能品味到很多诗句文字之外的东西。”^[7]

(二)《商颂》音乐之美

先秦时期,诗词、音乐、舞蹈是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礼记·乐记》云:“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5]1111-1112}这一论说充分体现了诗、乐、舞浑然一体的面貌。《诗经》305篇,均为配乐演唱的乐歌。《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8]368}《史记·孔子世家》亦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9]1936}梁启超据此谓:“孔子最嗜音乐,最通音乐,故反鲁之后,以乐理诏鲁太

师，又取三百篇之谱阙者补之，舛者订之，故云乐正而雅、颂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颂之文犹昔也。”^{[10]4652}《诗经》300余篇均可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孔子曾将其演奏歌唱出来，以求合于《韶》《武》《雅》《颂》这些乐曲的音调。不仅如此，孔子对音乐的感悟与理解能力极高，他当年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立马痴迷沉醉其中，以至“三月不知肉味”。

音乐表演产生的美感是以歌词之美为基础的，《商颂》的语言之美为其音乐之美奠定了基础，其音乐之美和感召之力亦为世人所公认。《庄子·让王》云：“曾子居卫，缁袍无表，颜色肿唃，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11]977}孔子的学生曾子在穷困潦倒之时，高唱《商颂》，声震天地，有如金石之音，让人心旷神怡。《商颂》带来的音乐之美，由此可见一斑。《商颂》之音亦因此得以流传下来，并由此而引申出“商颂遗音”“商颂振履”“振履商音”“商歌出金石”等成语，喻高洁之士安贫乐道、身处厄境而豁达。如唐代柳宗元《觉衰》诗云：“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宋代苏轼《诸公餞子敦弼以病不往》诗：“遥知送别处，醉墨争淋纸。我以病杜门，《商颂》空振履。”明代高启《白水冒我田》诗：“商歌出金石，愧无圣人师。”等等。

（三）《商颂》之四言诗体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作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源头，即以四言诗为主，《诗经》第一篇《国风·周南·关雎》就是一首整齐的四言体诗歌。其文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12]22-27}

《诗经·商颂》的第一篇《那》是祭祀商朝始祖成汤的乐歌，共22句，也是一首整齐的四言诗：“猗与那与，置我鞀鼓。奏鼓简简，衍我烈祖……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和《那》诗一样，《烈祖》全诗也是22句：“嗟嗟烈祖……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飨，降福无疆。顾予烝尝，汤孙之将。”除第16句“我受命溥将”为五言句之外，其余均为四言句。《玄鸟》《长发》《殷武》3篇，虽然四言、五言不等，但仍以四言为主。据统计，《商颂》5首共154句，其中五言体22句，六言体2句，其余之130句皆为四言体。

《诗经》的四言诗体为汉魏六朝的诗学家们所继承。比如，汉初诗人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汉张衡的《怨篇》、秦嘉的《赠妇诗》，三国时期曹操的

《短歌行》、嵇康的《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夏侯湛的《周诗》，东晋陶渊明的《命子》《归鸟》等，都是四言诗名篇。其中，韦孟的四言诗带有明显的《诗经》遗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曾赞称：“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4]66}沈德潜《古诗源·汉诗》亦谓：“肃肃穆穆，汉诗中有此拙重之作，去变雅未远。”^{[13]38}魏晋时期的四言诗，则以曹操的成就为最高，他开辟了一代诗风，也使得四言诗再放光彩。范文澜曾对此高度评价说：“立意刚劲，造语质直，《三百篇》以后，只有曹操一人号称独步。”^{[14]252}而陶渊明的四言诗，则可谓真正能全面把握《诗经》风格，将其圆融贯通而臻于至境，其《命子》诗承袭《诗经》雅、颂体之迹非常明显。曾有学者说：“真正做到对《三百篇》不仅得字句而且得精神的，便只有陶渊明。”^[15]

四言诗体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有其自身的优点。刘勰《文心雕龙》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4]67}认为四言诗属于“正体”，行文追求雅致温润。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云：“诗四言优而婉……四言《大雅》之音也，其诗中之元气乎？《风》《雅》之道，衰自西京，绝于晋宋，所由来矣。”^{[2]1402}陆时雍以为四言诗优柔和顺，故以四言诗为最佳范本。但是，囿于字数的限制，四言诗程式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胡应麟认为，与五言、七言比较而言，则“四言简质，句短而调未舒”^{[3]22}。正是因为四言诗有这些局限性，魏晋之后，这种诗体便不再流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兹不赘言。但是，不管怎么说，《诗经》在四言诗体上的首发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二、《商颂》的史学价值

（一）《商颂》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关于经部书籍的史学价值，清代史学家章学诚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6]1}梁启超云：“现存先秦古籍，真贋杂糅，几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故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重要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有诗时代及有诗以前之时代，正式之史未出现，而传记、讖纬所记古事多糅杂不可究诘。《诗经》既未经后人窜乱，全部字字可信，其文虽非为记事而作，而偶有所记，吾辈良可据为准鹄。”^{[12]4657}梁启超认为，《诗经》所记古事“全部字字可信”，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诗经》作为先秦时期可信的典籍，的确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一点是学界所公认的。

关于《商颂》5篇的题旨,不少学者做过论说。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讲到《商颂》时说:“《玄鸟》《长发》二篇具有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结合的特点,而富有商族史诗的因素。”^{[17]26}张西堂在《诗经六论》中认为,除了《玄鸟》与《长发》,《殷武》篇也可以当作史诗看待。洪湛侯认为:“《商颂》的《玄鸟》《长发》《殷武》……既有史诗性质,又杂有较多颂祷的内容,似乎不能算作纯粹的史诗,不过,它们还具有较强的史料作用。”^{[18]664-665}高亨认为:《商颂·玄鸟》“叙述商的始祖契诞生的传说以及成汤的立国为王,歌颂武丁中兴的功业。是一首简单的史诗”^{[19]527}。陈子展认为:“《玄鸟》一诗当与《生民》一诗同读。不妨同视为商周时代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自道其先祖开国之史诗。契为商祖,正与稷为周祖同。禹母吞薏苡而生禹,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弃。同属无父而生子之神话。”^{[20]1195}又说:“合《商颂》五篇读之,可作为殷商史诗读,则与已读之《小·大雅》多篇关于周先世开国之诗具有史诗性质者同也。”^{[20]1210}程俊英、蒋见元对《玄鸟》篇解读说:“诗中追叙部分,带有神话传说及史诗性质,和《大雅·生民》相似,可作史料读。”^{[21]1029}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商颂》5篇中的《玄鸟》《长发》《殷武》3篇,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商民族的史诗。其中涉及的内容大致包括:商族的来源,商先公契、相土及商王成汤、武丁等人的事迹,汤臣伊尹的事迹,商族与夏族的关系,商族与氏、羌、荆楚等部族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史诗不发达,没有出现像古希腊荷马时代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等鸿篇巨制的英雄史诗。唯其如此,《诗经》中这些史诗更加值得我们珍视。而司马迁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描绘出了商民族的起源并序列出了商先公的世系。《史记·殷本纪》篇末载:“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9]109}那么,司马迁是如何根据《颂》诗编次殷契之事的呢?

《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这几句话,以简练的笔墨勾画了殷商史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昭示了殷商始祖契受命于天的神圣地位;接下来写成汤受命征伐天下,安定四边,以论证商王朝的建立完全是天帝的意志。又《长发》云:“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这里进一步明确了殷商始祖契乃有娥氏之女受上帝之命而生,并赞美契治理国家政通

人和,商国因此由弱变强、由小国成为大国。

依据上述《玄鸟》和《长发》篇所载,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开篇云: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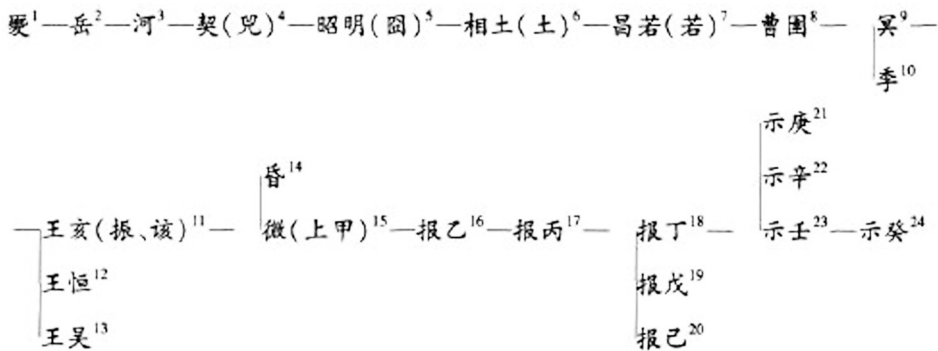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任立。主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9]91-92}

如上,司马迁不仅记载了殷商始祖契感天而生的神话,以及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其子孙汤受天命而享有天下等史迹,而且对殷商先公先王系谱做了明确的排列。那么,这些材料是否靠得住呢?这在当时条件下是无法证实的。不过,这一记载现在业已得到甲骨文的佐证。甲骨文可谓一部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殷商史诗。王进锋在《镌刻在甲骨上的史诗:殷商》一书“导语”中说:“现在,殷商人自己的记述为人们提供了铁证。正如考古学前辈李济说的:‘甲骨文的发现提供的新知识与两千余年前司马迁的记录相比,虽说是对每一个先公先王的认识,增加了许多,而对司马迁排的这一朝代先公先王继承的秩序,新材料只把它加了强有力的证实。’而这‘证实’两字的分量又有多重啊!”^[22]

根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先商时期商王祖先的世系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报丁——报乙——报丙——主任——主癸——天乙(成汤)。《殷本纪》所载契至汤共14世,这也与其他传世文献记载相合。《国语·周语下》云:“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23]131}又《荀子·成相》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24]464}这14世的先公名号在甲骨卜辞中均有记载,而且通过两相参照,互为印证,使得先商世系进一步充实和清晰起来。

那么,司马迁所列先商世系的可信度到底如何呢?现代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考索。江林昌综合各种甲骨卜辞资料,并对先秦文献中殷商先王之异名进行考释,在《由甲骨文资料试拟商族先公世系》一

文中,拟得商族先公世系方案如下。



江林昌对这一商先公世系分析说：“这份据甲骨卜辞所拟定的商人先公世系表，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直系先公世系与《殷本纪》基本一致。只是在开头部分多出了‘岳’与‘河’两系。第二，从冥开始有较多的旁系先公，表现为明显的‘兄终弟及’继承制。照理说，这种现象在‘冥’以前应该是更盛，只因资料缺乏，我们现在尚无从考证而已。”“因此，对《殷本纪》所载的先商先公世系的正确认识应该是，先承认这份先公世系是可信的，同时，又应该认识到这份先公世系是不全面的”。对司马迁所列先公世系不全面的原因，江林昌进一步分析说：“甲骨文祭祀制度中有‘只祭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则不与’的原则。据此推测，《殷本纪》所载先商先公世系，只保留了先商先公的直系世系，而旁系先公世系被淘汰省略了。”^[25]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司马迁依据《商颂》对商族起源的描述以及所排商先公世系的序列是可信的，因之成了人们心目中笃信不疑的历史。而《玄鸟》《长发》等篇的史诗性质，亦有同时期的文献记载为之佐证。如《玄鸟》篇所云“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等等，赞颂商代先王皆能奉行天帝旨意，而武丁尤能敬行天命，克尽其职。这些记载也得到了《尚书》的印证。《尚书·周书·多方》载：“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孔安国《传》：“言自汤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辅相，无不明有德，慎去刑罚，亦能用劝善。”孔颖达《疏》：“汤既为民主，慎其所施政教于民，民乃劝勉为善。其民虽被刑杀，亦用劝勉为善。非徒汤圣，后世亦贤。自汤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无不显用有德，畏慎刑罚，亦能用劝勉为善。”^{[26] 669-670} 明初学者蒋梯生《五经蠡测·毛诗·商颂》云：“夫商有天下六百余年，至武丁孙子犹能若此，则五百年间，商之威令可谓盛矣，不若东周以后衰微，王令不行也。《书》云：‘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

明德恤祀，罔不明德慎罚。’验之《诗》而益信。”^[27] 又如《长发》篇云：“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歌颂商契布教施政使商族发展兴盛，他循礼守法、敬业爱民，故深受商民敬重。《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23] 466} 意思是说商契把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这一记载可与《长发》相互印证。

(二)《商颂》蕴含着先进的史学思想和治国理念

《商颂》一些篇章饱含对时代英雄的赞美以及对国家统一强盛的讴歌，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史学功能。时代呼唤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国家的统一乃时代的要求。在《商颂》中有很多诗句反映了这一思想，比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玄鸟》）；“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长发》）；等等。殷契禀受天命降生人间，意味着他天生具备良操美德，属于不世之材，所以能够统领商民使商民族变得强大。商汤承继契之遗德余烈并发扬光大，积极进取，扩大疆域，最终灭亡夏朝建立商朝。“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长发》）等诗句，是歌颂成汤乘坐兵车，冲锋陷阵平定天下的勇武和智谋。“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殷武》）则渲染了当年成汤深受天下拥戴的情景。这些赞美英雄祖先以武力征服、统治天下的颂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它所体现出来的尚勇、敬祖、尊贤的精神特质，也使中国古代帝王美德得以传承发扬，对后世统治者治国安邦起到了积极的警示作用。

君主治国安邦，须有贤臣良相辅佐。《商颂》个别篇章也隐含着这一施政理念。如《长发》云：“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这里是赞颂商汤圣明诚敬，把治国重任交给其卿士阿衡，而阿

衡也确实起了辅佐商汤的作用。这个阿衡(商代师保之官)是谁呢?他就是汤的佐命之臣伊尹。伊尹,姒姓,伊氏,名挚。商朝建立后,商汤封伊挚为尹,故称伊尹。《史记·殷本纪》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曰:“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9]94}“正天下”就是以身作则,作天下楷模,师范天下。孟子曾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28]89}商汤先向伊尹学习,然后才让他辅政,于是不费大力气就统一了天下。可见,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帝王之师。《孟子·万章》篇又说伊尹“以尧舜之道要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28]225}。伊尹教汤效法尧舜以德治天下,并用讨伐夏桀、拯救百姓的道理来说服汤,商汤因之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商汤死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果然有了良好的表现。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史记》称“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9]99}。

可见,商汤虽以“武功”立国,但同时注重以“文治”安国。《长发》所载伊尹“左右商王”治国,虽然道出了这一施政理念,但因为《商颂》诗体本身的局限而未能言其详。而关于这一点,除了上述《史记》《孟子》所载,还有其他文献记载可为佐证。比如,《吕氏春秋·简选》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郟,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29]441}又《淮南子·修务训》云:“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1]1315}商汤选贤任能,布德施惠,善待百姓,因之而王天下,远近归附。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后世“文治”“仁政”的肇兴。

(三)《商颂》体现了商周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向

历史具有连续性、继承性、断裂性和创新性等特性。历史发展的这些特性是辩证统一的,它们贯穿于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之中,包括改朝换代的革命创制。孔子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0]21-22}这里说的就是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

就商周二代文化而言,周代在神权崇拜、礼乐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承袭了商朝。殷商末年,纣王无道,失去民心,纣的乐官便带着乐器投奔周朝。《史记·周本纪》云:“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9]121}

又《史记·周本纪》载:“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11]108}既然乐官抱走的乐器是“祭乐器”,假定作为殷商祭歌的《商颂》是商人所作,那么它自然也会被带到周人那里。殷商的祭祀乐舞流入周人之手并为周人所用,也还有文献记载为证。《逸周书·世俘》云:“(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31]454}“万舞”是殷商著名乐舞之一。这一记载证明殷商《万》乐曾演奏于武王克商后的礼典中,亦可证明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对《商颂》研究颇有建树的姚小鸥认为:“《商颂》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32]关于《商颂》创作年代的争论,之所以存在“商诗说”和周代“宋诗说”,是因为《商颂》文本中杂糅了商周二代文字的特点以及礼乐文化的共性等^[33-37]。这也正说明了《商颂》体现了商周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向。《商颂》是商诗还是周诗,迄无定论。《商颂》即便是为商人所作,但至孔子编《诗》时已历经数百年,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世周文化的熏染,因此在《商颂》中周文化的痕迹也是非常明显的。如关于礼制思想,商人奉行的是“先鬼后礼”的神权政治,商代礼制主要体现在祭祀的仪式相当频繁、隆重等方面,与周礼“亲亲、尊尊、长长”的核心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而《殷武》篇有云:“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就是说商王行事是受上天监督的,赏不越级,罚不滥施,下民也不能懈怠懒惰。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本分守礼、奉行礼制,从侧面体现了周王朝的礼制思想。再如前文提到的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这是周王朝吸取殷商因暴政而亡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出来的基本治国理念,而《商颂》因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周文化的熏陶浸染,也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比如,《长发》云:“不竞不隳,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殷人向来以尚武尚勇为荣,这里赞美汤王施政刚柔并济,温和宽仁,明显是周王朝的施政理念。换一句话说,就是体现了周王朝的德政思想。

商周文化是相因相袭的,有同也有异。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中互补、融合,并最终形成一些华夏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念——中华文明的主脉,诸如天人合一、敬天恤民、重德行善等。

参考文献:

- [1]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胡应麟.诗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4] 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5]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7] 陈桐生.《诗经·商颂》的语言之美[J].殷都学刊,2013(4):51-56.
- [8] 王焕镛.墨子校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
-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16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 [11] 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
- [12]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3]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 [15] 范学新.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的传承关系[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23-127.
- [16]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 [18] 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9] 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0] 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 [2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22] 王进锋.镌刻在甲骨文上的史诗:殷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23] 徐元浩.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4] 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5] 江林昌.由甲骨文资料试拟商族先公世系[J].中原文物,2011(4):24-29.
- [26] 孔安国.尚书正义[M].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7] 蒋悌生.五经蠡测:卷五[M].钦定四库全书本“经部”.
- [28]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29]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 [30]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1]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32] 姚小鸥.殷周两代的文化遗产与《商颂》的流传[J].北方论丛,2015(3):10-14.
- [33] 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J].文学遗产,1986(5):19-23.
- [34] 黄挺.《诗·商颂》作年作者的再探讨[J].学术研究,1988(2):104-109.
- [35] 曾志雄.《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3(1):90-98.
- [36] 韩国良.诗经商颂作年补证[J].中州学刊,2015(2):151-158.
- [37] 闫孟莲.《诗经·商颂》为商人旧作[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3):133-136.

An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Ode to Shang in The Book of Songs

ZHU Fengx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476000, China)

Abstract: Ode to Shang in The Book of Songs is an ancestor worship song for the descendants of Shang Dynasties. It shows the beauty of the language and music of its text in a unique form of creation, thus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literary language in the Shang era. At the same time, as an epic of the Shang people, i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appearance of that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fore it has a high literary value.

Key words: Ode to Shang; literary value; historical value

(责任编辑:韩大强)